

按此故事雖無稽，但匈奴伐于闐，據後漢書西域傳記，實有其事。莎車國條云：『匈奴聞廣德滅莎車，遣五將、發焉耆、尉犁、龜茲十五國兵、三萬餘人圍于賓，廣德乞降，以太子爲質。』時後漢章帝元和間也（公元後八四—八六年）。今以兩書所記合併觀察，必同記一事。但可注意者：瞿薩旦那王建祠設祭，祭以弓矢肴膳之事，此皆非佛教所宜有。綜上諸例證，是自前漢昭宣以後，至後漢章帝之末，（公元前七四—後八八年。）于闐無流行佛教之事。又在此期間，中國勢力擴展至西域，使臣來往，不絕於途。雖中間有一時期，政治上與西域斷絕關係，而交通大道並未廢弛。然中國之使西域者，從無一人提及佛教事。和帝以後，西域復內屬，班超父子駐屯西域時間最久，而甘英且西至波斯海灣，亦無一語道及。則後漢明帝至安帝之初，佛教在西域爲一般人所漠視，從可知矣。雖魚豢魏畧有『漢哀帝元壽元年，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』之記載；然以爲老子西出關，過西域，之天竺，教胡浮圖所云。其對佛教觀念之不明確，由此可知。後漢書西域傳亦有『漢明帝夜夢金人，遂遣使天竺，問佛道法之事；』但范蔚宗首稱「世傳」，結論謂『桓帝好神教，祀浮屠，老子，百姓稍有奉者，後遂轉盛。』是明明暗示中國佛教之流行，始於桓帝以後也。故其西域傳贊論云：

『佛道神化，興自身毒，而二漢方志，莫有稱焉。張騫但箸地多暑濕，乘象而戰。班勇雖列其奉浮屠，不殺伐，而精文善法，導達之功，靡所傳述。……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，桓帝又修華蓋之飾，將微意未譯，而但神明之耶。』

是當時以佛教列於鬼神之儔，僧侶比於方士之林，未嘗認爲特立之宗教，並含有高深之哲理；由蔚宗所云，概可知也。中國之情形既如此，則西域情形當亦相類。據此以言，則玄奘所記，西藏所傳：毘盧旃始到于闐傳佛教之事，無論其年代如何，然皆爲一種傳說。即令有一二外方僧侶，寄居于闐，信奉佛教，並未足以改變其風俗、影響於社會，而爲于闐國人所崇拜，則可斷言也。鄯善與于闐相接，于闐既如此，則鄯善亦可知矣。

然則于闐及鄯善國人自何時始信奉佛教；余按佛教傳播歷史，疑自貴霜王朝之迦膩色迦王始也。按後漢書西